

编者按 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取得积极进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局限,因此有必要进行阶段性的梳理和总结。比如,如何理解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的缘起和现状?国内民族问题研究有何特点?有哪些代表人物?已有研究存在哪些局限?如何看待民族问题研究的发展前景?为此,本刊记者王海媚专访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副院长王军教授。王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主义与民族冲突管理、网络政治与外交,代表作有《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历史与理论》《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网络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等。

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 研究:进展与问题

——王军教授访谈

本刊特约记者

一、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状况

问:请您梳理一下国际政治视野下民族问题研究的发展脉络?

答: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这个议题比较复杂,想要准确把握它,首先要厘清“民族问题”和“国际政治视野”这两个核心词在不同学科领域

中不同内涵。

第一个核心词汇是民族问题。在界定民族问题之前,先要知道什么是民族。中文所说的民族对应着英文中一连串概念,比如 nation, ethnics, ethnic group, people, peoples, race(种族), nationality(国籍、族性), nationhood, tribe(部落、部族);有时候还特指 minorities(少数民族)或者 aboriginals, indigenous people(土著人),等等。这些英文单词的内涵有时有交叉,有时有很大差别。因此,国际社会和学界对如何界定民族一词存在很多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就民族给出明确统一的定义,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民族,实际上是具有多重含义的。

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理解民族问题的内涵。从广义角度看,中国官方所讲的民族问题是指“一个发展、三个关系”,也就是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1990年2月听取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民委)主任会议汇报时所给出的定义:民族问题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还包括民族与民族的关系,民族与阶级的关系及民族与国家的关系。^①这里的民族问题是一种议题,涉及到民族的方方面面,有较强的政策内涵。从狭义角度看,学界对民族问题的定义是:民族与民族之间,以及民族与国家之间所产生的摩擦、纠纷、矛盾和冲突。这里的民族问题可以还原成问题,侧重从冲突角度讲民族问题,或者说民族问题也就是民族冲突。与广义的定义相比,学界更愿意从狭义层面来定义民族问题,因为后者边界更加清晰。但从政府文件中(特别是国家民委发布的报告和文件)所看到的民族问题,通常在两个定义之间游移。今天从国际政治角度出发谈民族问题,主要涉及冲突意义上的民族问题,这是第一个要厘清的核心词。

第二个核心词汇是国际政治视野,有三点需要说明。(1)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不同于常规的、基于田野调查的民族学微观性分析。我国民族学界的代表人物费孝通去某个民族地区的某个村落进行实地考察,以小群体或社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希望用一种个体主义的范式,把对中国民族的研究还原到不同区位,把有代表性的民族问题叠加起来,变成一个整体。这种研

^① 江泽民:《在听取全国民委主任会议汇报时的讲话》,《人民日报》1990年2月1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2/13/content_10812801.htm, 2016-12-19。

究比较扎实和精细,属于国内视野的一部分,而国际政治视野具有较强的整体主义特征。(2)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不同于民族问题研究领域的弱政治或非政治的文化研究或社会网络研究。国际政治视野属于国际视野的一部分,但落脚点在于政治。当然,无论是强政治的研究还是弱政治的研究都是有益的,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能够从跨国的文化研究或社会网络研究那里获得营养和帮助。(3)国际政治视野不同于国际政治学视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史学等学科结合各学科的自身特点,从国际视野、政治视野看待民族问题,这里提到的国际视野可能会包括好几个学科进路。因此,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具有跨学科特质,这与国际政治学视野是不同的。综合来看,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多学科的、涉及民族问题的研究。

问:您上面所谈的内容主要是解决研究的边界问题,那么,您如何看待国际政治视野下民族问题研究的缘起?

答:大体从两方面来梳理。第一个方面是指国际政治学民族问题研究的缘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当时国际政治学研究内容就包括民族问题。比如,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过教授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十四点计划》里明确提到一些民族议题,包括反殖民、民族自决等。但是,早期的国际政治学研究并没有把民族问题当作一个重要议题,甚至在整个冷战时期一度忽略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这种相对忽略态度可以用层次分析法来解释。也就是说,不同含义的民族与各个分析层次都存在一定联系,但其意义有时被忽略,或只是关注非常少的几个主题。从全球体系和地区性国际体系层次来看,这两个体系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问题关联性相对较弱,但民族作为行为体可以存在其中,比如,跨境民族便是国际性行为体,一些国际性地区问题是民族问题引发的(如巴以冲突)。从国家层面来看,国家与民族是强关联的,比如,当前国际体系也被叫做民族国家体系,但在国际政治学语境中,当把民族等同于国家或国族的时候,国家概念就替代了民族的概念,比如,我们提到中华民族与某些国家的关系的时候,实际上是指中国与这个国家的关系,因此,国际政治学界较少在这个维度讨论民族问题。从国内和个人层面来看,在国内的次区域内,民族群体是普遍存在的,但主体民族大多民族意识比较弱,它们主导的对外交往也往往基于国家意识而展开。国内意义上的民族

问题主要是民族分离主义被纳入国际政治学研究的范畴。借助层次分析法不难发现,虽然民族同每个层次都有联系,却很容易被其他概念替代,或关注主题有限。从历史角度来看,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始终存在,但在一段时期内没有被充分强调、聚焦和认同。

在苏东剧变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几个主流学派都在反思,为什么没能预测到冷战格局会以和平的方式终结,人们逐渐意识到,在苏东剧变中,民族主义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因。有人认为,民族主义、民族问题是苏东剧变最重要的原因,我个人不太赞同这个观点。民族问题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它更多地是接盘者,在苏东剧变这样一种强国家走向衰败的过程中,民族主义逐渐成为新政治秩序的接盘者,这是一种后果,而不能说它是导致国家走向失败的原因。所以,西方部分学者在冷战结束后写了很多文章来讨论族群冲突与国际安全,民族主义与暴力等问题,^①他们试图探求民族问题研究对解决国际安全、国际冲突和国际合作等问题的意义。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史蒂夫·艾维拉(Stephen Evera)曾在《有关民族主义和战争的假说》一文中,专门讨论民族主义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让战争的风险变得更大。^②可以说,国际政治学的民族问题研究具有一条呈现上升趋势的发展曲线,民族问题研究最初就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但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直到冷战结束后,学界逐渐意识到其重要性。学者们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和探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入。

第二个方面是指民族学、社会学结合国际政治视角开展民族问题研究的缘起。以国际政治视角研究民族问题不是民族学、社会学的主流研究路径,但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早在19世纪20、30年代,民族学在西方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出现,该学科以群体、社区(community,文化意义上的小社区或者共同体)

^① 代表性的文章有:Jack Snyder, "Nation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Post-Soviet State," *Survival*, Vol. 35, No. 1, 1993, pp. 5-26; Barry R. Posen,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Survival*, Vol. 35, No. 1, 1993, pp. 27-47; Michael E. Brown, ed.,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Michael E. Brown, et al., ed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7.

^② Stephen Van Evera, "Hypotheses on Nationalism an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2, 1994.

为主要研究对象。^① 民族学的产生与工业革命的兴起密切相关,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殖民扩张,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开始对非西方殖民地的初民社会进行研究,并称之为人类学或民族学研究,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国际视角和复杂的国际政治意涵。除此之外,民族学里面有一些分支学科也与国际政治学有一定联系,如西方的政治人类学主要研究土著或其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异文化,其他区域的国家起源和政治制度等问题。20世纪40年代,这一科学领域有一系列重要作品,如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撰写的《努尔人》一书,翔实地描述了苏丹努尔人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撰写的《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对缅甸的克钦人和掸人的政治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利奇的人类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被称为新结构主义,同时也具有国际政治视野。上述作品都是对较小区域内的政治制度进行研究,侧重点在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些超越小地区、小群体的研究,代表作如英国人类学家迈耶·福蒂斯(Meyer Fortes)与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合编的《非洲的政治制度》一书,两位人类学家在非洲殖民地开展田野调查,实地研究政治、宗教、亲族和婚姻等制度在非洲社会系统中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属于比较典型的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②

20世纪30、40年代,民族主义研究开始在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兴起。美国学者卡尔顿·海斯(Carleton Hayes)和汉斯·科恩(Hans Kohn)被称为“民族主义研究的双子星座”或“民族主义研究学界的孪生奠基人”,海斯的《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和科恩的《民族主义思想》等著作都是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品。^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学者们对民族主义的研究慢慢增加,该时期的代表作品有英国学者埃里·凯杜里(Elie Kedourie)的《民族主义》,凯

① 民族学有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不同传统对这个学科的叫法也各有特色,英美传统称其为文化人类学,以苏联为代表的欧陆传统称其为民族学。

② [英]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褚建芳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英]埃德蒙·利奇:《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杨春宇、周歆红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英]M.福蒂斯、E. E.埃文思·普里查德:《非洲的政治制度》,刘真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③ [美]海斯:《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帕米尔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4。

杜里在该书中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和分析。^① 20世纪80年,民族主义研究进入繁荣期,出现了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1983现象”,即1983年有三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出现,分别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英国学者厄内斯特·盖尔纳(Ernst Gellner)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和英国学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人的《传统的发明》。这三部书都包含了对民族主义元理论的讨论,也是现代主义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作,他们对世界范围内不同类型与阶段的民族主义做出了讨论。^②

从整体上看,在社会学领域只有少量从国际政治视角研究民族问题的作品,因为社会学学界往往把社会等同于国家,^③因而他们的研究大多限于国内问题。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将自己的研究与国际政治进行结合,如社会学鼻祖之一马克斯·韦伯曾撰文《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分析德意志和波兰两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特性在经济竞争中如何发生作用。韦伯的这一分析具有国际政治视野。^④ 安东尼·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将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做了综合性分析。他在对民族国家进行定义时加入国际政治视角,把自己的结构化理论与国内政治研究相融合,这与对他影响很大的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有所不同。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在《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一书中设定了一个经典的命题,即“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⑤这里所讲的国家是现代民族国家,战争背后映射出的是具有竞争性的国际体系结构。可以说,梯利的研究与吉登斯的研究在此意义上有相似性。虽然早期的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已经具有国际政治视野,但到了20世

① [英]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1983;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兰格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其后现代主义民族主义研究进一步分头探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20世纪末写了《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全球》一书,主要研究东南亚的民族主义和东南亚的政治制度变迁,旨在与查特吉的民族主义研究展开对话。

③ 安东尼·吉登斯曾说过:当你翻开西方社会学的书,会发现他们经常把社会等同于国家。

④ [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19世纪,在德国东北部比较贫穷地区有大量波兰农民涌入,这些波兰农民与当地的德国农民产生竞争,在竞争中波兰农民一度占据优势。这件事引发了韦伯的思考,于是,他在文章中讨论这种竞争跟族姓、种族的关系,并呼吁德国政府出台政策保护这一地区本民族的农民。

⑤ [美]查尔斯·梯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纪80年代,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才越来越多。西方某些民族学、社会学领域的期刊杂志也开始结合国际政治和比较方法来研究民族问题,如《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民族主义与民族政治学》(*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民族与种族研究》(*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等杂志便刊登了不少相关论文。^①

综合上述,不难发现,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的缘起包括多条线索,彼此有交汇有分离,既有个性也有共性。这种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为传统的只针对小群体的研究者打开了新的窗口、拓展出新的道路。

问:请您系统介绍一下国内学者在该领域主要的研究议题、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

答:在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中,国内学者的议题设定丰富多样,有代表性议题包括民族主义理论与经验研究、全球热点性的民族冲突个案研究、民族冲突的第三方干预与全球治理研究、民族问题与宗教的关联性研究、跨界(境)民族问题研究、世界范围内民族政策和民族制度研究(通过国别或者比较政治视角)、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研究(这个议题西方学者研究的较多),以及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化、民主化、城镇化等社会发展进程与民族问题的关联性研究、国家建构与民族问题研究(包括国族建构与民族问题、民族文化关系等议题)等等。这是近5—10年来国内学者研究较多的大议题,涵盖的小议题更加丰富。

针对不同议题,国内学者会选择不同的研究路径。有学者从国际政治学角度开展研究,有学者从区域国别、比较政治角度开展研究,有学者从民族政治角度开展研究,还有的学者从史学角度特别是世界史和文化角度开展研究。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包含了多样的研究方法,但整体来说,传统的质性研究仍然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近年来,也有少量的量化研究出现,有学者运用科学方法、实证主义进行民族问题分析,或者运用海外数据库进行量化研究,如唐世平和熊易寒合写的《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升级》一文就是利用族群权力关系数据库(Ethnic Power Relations,简称EPR)数据库的

^① 这三个期刊的网址分别为:[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0.1111/\(ISSN\)1469-8129](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0.1111/(ISSN)1469-8129);
<http://www.tandfonline.com/loi/fnep20>;<http://www.tandfonline.com/toc/rers20/current>。

地理信息系统(GIS)中文版本进行研究的,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尝试。^①

在国际政治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冲突研究领域,有很多国外学者擅长使用数据库作为研究工具。国际上有几个重要的民族类数据库值得一提,比如,“处于风险中的少数人数据库”(Minorities At Risk, MAR)、^②马里兰大学的族群权力关系数据库(Ethnic Power Relation, EPR)、^③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宗教和国家少数人数据库(Religion and State-Minorities, RASM)、^④乌普萨拉大学的冲突数据库(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UCDP)、^⑤以及一些恐怖主义研究数据库也涉及到民族冲突等问题。美国预防恐怖主义纪念研究所(The Memorial Institute for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 MIPT)的恐怖主义知识数据库(The MIPT Terrorism Knowledge Base, TKB)对世界范围内由民族主义或民族分离主义组织造成的恐怖袭击数量和人员伤亡数量进行统计,并对所有导致恐怖袭击的因素进行排名。^⑥ 这些数据库对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二、国内学者民族问题研究取得的进展

问:在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中,国内学者进展如何?

答:国内的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高校系统等研究机构为依托。近年来,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国内民族类高校、还有一些位于民族地区的非民族类大学等学术科研机构对民族问题的关注程度逐渐增加,一些重点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机构也越来越关注民族问题,随之涌现出很多代表学者和代表作品。

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前所长郝时远先生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地位非常高。郝先生主要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同时也很关注世界民族问题的动

① 熊易寒、唐世平:《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升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第83—103页。

② 参见网址 <http://www.mar.umd.edu/>。

③ 参见网址 <http://www.epr.ucla.edu/>。

④ 参见网址 <http://www.thearda.com/>。

⑤ 参见网址 <http://www.ucdp.uu.se/>。

⑥ 参见网址 <http://www.mtholyoke.edu/~lhgarner/worldpolitics/tkbsite.htm>, 2008年后,该数据库合并至马里兰大学的“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之后,涉及民族问题的次级指标被取消了。

态、走势,特别是民族问题与恐怖主义的相互联系。王逸舟老师主编的《恐怖主义溯源》一书就收录了郝先生的文章,郝先生在文章中分析了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勾连案例、机制与成因。^① 社科院世界民族研究室前主任朱伦教授,以西班牙为主要研究对象,提出了“民族共治”的概念。朱伦教授对于国外的民族理论、民族类政党的研究非常深入。^② 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理论室研究员陈建樾关注全球的族际政治问题,他与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建娥合编了《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一书,主要研究的是全球族际政治问题及族际政治现代国际建构中的作用机制。^③ 有学者专门研究民族冲突和族群冲突等问题,代表作有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王剑峰的《多维视野中的族群冲突》《族群冲突与治理》和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赵磊的《国际视野中的民族冲突与管理》等。^④ 有学者比较关注西方的多元化主义,代表作有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常士闾的《政治现代性的解构:后现代多元主义政治思想分析》《异中求和: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研究》等。^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周少青也关注多元文化主义,他对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的作品研读很到位。同时,他还关注少数民族权利保护问题,代表作有《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与国家安全问题》等。^⑥ 关于少数群体权利保护的科研成果还包括原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勇的《少数人权利的法理:国际法上对少数人权利的司法保护及其案例法》《自治与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国际新观察》等。^⑦ 近年来,少数民族集体权利的合法性问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反思,我国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探讨差别化的少数民族权利的来源问题,提出了“公共性假定”“弱势假定”“道德

① 王逸舟主编:《恐怖主义溯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② 代表作有朱伦:《民族共治论: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事实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③ 王建娥、陈建樾等:《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④ 王剑峰:《多维视野中的族群冲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王剑峰:《族群冲突与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赵磊:《国际视野中的民族冲突与管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⑤ 常士闾:《政治现代性的解构:后现代多元主义政治思想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常士闾:《异中求和: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⑥ 周少青:《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与国家安全问题:以国际(人权)法为观察视野》,《世界民族》2013年第1期。

⑦ 周勇:《少数人权利的法理:国际法上对少数人权利的司法保护及其案例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周勇:《自治与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国际新观察》,《中国民族》2001年第4期。

假定”“历史性假定”“补偿-激励”这五种假定,试图解释国际范围内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来源和根基到底是什么。^①

一些高校对区域性的民族问题研究比较多,比如,兰州大学主要研究中亚问题,西北大学主要研究中东和中亚的民族问题。社科院国际片的研究所以对俄罗斯(苏联)的民族问题、美国种族族群问题、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民族问题,还有加拿大的土著人保护等问题都有很深入的研究,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问:您认为国内学者在民族问题研究上取得进展的动因是什么?

答:国内学者在这个领域取得的进展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学科内在动力推动下,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有了新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国内学术呈现繁荣景象,民族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的科研队伍逐渐发展壮大,不断有新议题和新的研究领域被发掘出来,国内学者接受了更加规范和扎实的方法论训练,他们的科研成果质量有所提高,创新点的发掘也在不断增加。

第二,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的发展是事件刺激和时代潮流刺激的复合结果。如果说学科内在动力推动是学术研究供给端的发展,这里强调的是需求端的推动。冷战结束并没有像自由主义学派预测的那样出现“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之争不仅没有随之结束,相反,还出现了民族主义的第三次浪潮、苏东剧变这样的重大事件凸显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再看最近的全球格局,民族问题又进入新的热点周期。全球的恐怖主义、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中亚东欧的国家的“颜色革命”,世界各地的武装冲突、政党选举等很多热点问题,都与民族问题勾连。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失败论主要针对的是中东、北非的穆斯林移民问题,其中既包括文化冲突的问题,同时也包括不同民族的移民/难民问题和种族歧视问题。从“阿拉伯之春”到乌克兰危机,都与民族化问题有密切联系。最近10年来,从全球稳定状态来看,赤道非洲国家是脆弱性指数(Fragile States Index)最高的国家,那些国家的国内战争多由民族冲突引发,如卢旺达、乌干达、刚果这些国家发生的种族屠杀或者持续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可以说,冷战结束后的全球范围内的武装冲突主要以内战为

^① 王军:《少数民族差别性权利的正当性:理论基础与范式》,《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

主,而这些内战又与民族冲突有很强的关联。再看中东北非这个破碎地带,从库尔德问题到伊斯兰国问题,再到卡扎菲下台之后利比亚的部族冲突问题等,都与民族问题紧密相关。在这个大的破碎带中新老的民族冲突和政治动荡刺激了难民和移民问题,而这些难民和移民来到欧美之后又形成新的民族问题。近年来,全球化进程遇到地方化进程的抵制,民族问题是其中重要的反对力量。与此同时,人们最初认为民主化的进程能够化解民族问题,但事实证明,民主进程可能会激化族群冲突。在南苏丹、冈比亚、科特迪瓦等非洲国家常会出现不承认选举结果或者投票舞弊等情况,那里的选举成为族群之间争夺政治利益的工具。在乌克兰这样的转型国家,历次总统和议会选举中,族群政治始终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发挥作用。这些重大事件和时代潮流缠绕在一起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民族问题,迫切需要学界做出分析和回应。因此,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的需求端是很旺盛的。

第三,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中跨学科研究的意义日益凸显。在民族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跨学科研究逐渐被推崇、发掘和强调,原因在于人们发现,学科分类太过细化不利于对复杂现象做整体性把握和分析,并且在学科发展中还存在某些山头主义现象,这给学科研究带来视觉限度。我时常把一个学科比喻成一个知识的巷子,巷子两边围墙的阻挡作用是很明显的,这对学科发展是很不利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在《所知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科学》一书中强调,要回归到历史社会科学角度去做研究。^①因此,跨学科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成为大家认同的趋势,这同时也成为促进此研究发展的重要动因。

问:请您简要介绍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特点。

答:可以从四个方面概括国内学者相关研究特点。

第一,该领域研究议题的设置和研究领域的拓展情况与西方学术前沿相类似,国内学者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与西方学者没有明显差别。

第二,国内学者对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具有跟着热点走、跟着趋势走的特点。这两部分内容与前面讲到的内容相对应,就不展开说了。

^①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第三,该领域的中国学派意识业已凸显,国内学者在民族问题研究中的三大研究进路得到学界普遍认可。第一个是“燕京学派”。该学派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以民族群体、民族社区和民族共同体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西方民族学的传统路径,并在研究过程中融入中国特色。费老研究江村经济,以及他在云南、广西等民族地区开展的田野调查都属于这种研究路径。第二个是“延安学派”。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派出一批学者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该学派的研究路径沿用至今。“延安学派”有一套自己的研究传统,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作家作品,我国领导人的言论、中央文件,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类政策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可以说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第三个是“史学派”。“史学派”就是用历史学的进路来研究民族问题,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傅斯年、顾颉刚先生等。顾先生曾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①顾先生的这种提法引发了学界的大讨论,傅斯年先生赞成顾先生的观点,费先生则写文章批驳了这一说法。实际上,费先生和顾先生看待这一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费先生从民族学角度出发,认为中华民族是由多个民族共同组成的,而顾先生是从政治角度出发,使用的是国族意义上的民族。当费先生意识到这个差异和政治偏好之后,就不再反驳顾先生的观点了。新中国建立后,费先生又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文章立意可以看出,他已经把自己的观点和顾先生的观点融合在一起了。^②这场关于国族认同问题的讨论持续至今,前些年围绕着“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第二代民族政策”、国族建构等问题,“史学派”又与“燕京学派”“延安学派”发生了更多的互动和争论。中国学派间的这场大讨论具有浓厚的国际政治背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和以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争议也包含其中。起初这场大讨论与日本侵华战争等很多国际问题密切相关,而当下的讨论还涉及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政策应师法谁、该往哪里去的问题,因而既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

第四,国内学者在国别、区域民族问题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有些学者深耕了某些专题,就该议题做出了深入、细致、有特点的研究,代表作有社科

①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1939年2月9日。

② 参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陈联璧等撰写的《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和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赵常庆等撰写的《苏联民族问题研究》。^①有些学者在做民族问题研究的时候,能够与国际趋势相结合,把热点问题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发展趋势或者说社会发展进程中去呈现和挖掘,这样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韦民教授所著的《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的互动》等。^②

三、国内学界的民族问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问:您认为,目前国内学界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中存在哪些不足?

答:此领域存在的问题与前面提到的特点是对应的。概括来说,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高质量的作品相对匮乏。前面已经提到,国内学者在研究议题与研究方法方面都与西方学者的覆盖面大致相当,但从作品质量来看,无论是与西方的学术前沿相比,还是与国内主流学科相比,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领域缺乏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缺乏有深度的作品,有些作品的研究内容缺失明显。比如,我最近在研究跨界民族的课题,当通读完国内关于跨界民族问题研究的代表作后,切实感觉到了上述问题。所谓研究内容缺失的问题,是指我发现有些作者以跨界民族为题,但主要研究该民族群体的国内部分,忽略了跨界的内容,在作品中缺乏对族群跨越边界活动方式及其作用机制的分析和探讨;有些学者重点关注跨界要素,但又忽略了民族族性的内容与影响。研究深度和广度不足,原因可能是这些作者的视野受到时代知识的局限,思路无法充分打开,另外受外语水平所限,缺乏对外文文献的掌握和了解。此外,他们缺乏实地调研,与社会现实脱轨,这些因素都影响作者对该议题的研究。

第二,学派意识很强,尽管学科基础扎实,但各学派研究存在明显局限。我国民族问题研究的三个主流学派各有优势又各有局限,加之各学派之间的

^① 陈联璧:《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赵常庆:《苏联民族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② 韦民:《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的互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交叉和联系不足,导致学界在整体把握复杂问题的能力方面存在欠缺。比如,在中央民族大学,不同院系的研究风格直接与不同学派相对应。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受“燕京学派”影响较大,他们的研究多为文化研究,虽然跟政治有一定关联,但这种关联相对较远。“延安学派”是以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为阵地的,这个学派主要研究经典作品、领导人的言论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制度,以文本研究为主,缺乏基层的田野调查,面对复杂的社会变迁,没能很好地回应现实的需求。“史学派”对应的是历史文化学院,该院的老师们主要关注历史研究。因此,虽然目前国内学界有了学派意识,也有了研究的基本路径,但问题明显存在,需要继续拓展。

第三,跟风研究导致研究基础薄弱。国际政治视野下民族问题研究的一个特色是跟着热点走,跟着世界热点问题和国家大政策走。当前,某些针对“一带一路”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就是这样的例子,这种研究往往可能存在基础不扎实的问题。智库往往非常关注当下热点问题,但它们给出的短平快和直接性事实陈述与政策建议基础不牢。概括来讲,现在的学术研究有太强的项目导向、智库导向色彩,学术研究的工具化色彩在强化,短期团队攻关性质的研究在增多,但研究基础不牢、创新性内容不够。实际上,上面提到的“一带一路”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面临的问题恰恰凸显出原有的国别、区域研究的重要性,需要针对这些议题开展长期而扎实的学术研究。

问:您认为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并促进该领域的学术发展?

答:首先,应该敬畏学术,养成科学的问题意识。应该客观地认识这个世界上纷繁复杂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进行更加扎实的方法论训练,下功夫凝练真正的学术问题意识,扎扎实实地做研究。目前,国内某些研究受到明显的现实问题意识驱动,这是因为存在一种快速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但学术研究不应该被这种问题意识束缚,而应该有更宽更高的眼界。在我看来,对社会发展中一些典型的或者重复出现的民族问题,不少研究已经不具有学术意义了,因为学界早已就这些问题进行透彻的研究,发现其中的核心机理,开出有效的药方。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现实问题已经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重复出现的社会事实。要建立学术意义上的问题意识,应以学科思想史为基础,分析民族问题研究领域事物与现象背后那些尚未被有效或充分阐述的要素,以及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与关联性。如果这种关联性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那就形成一种规律;如果这种关联性稳定性弱些,那就是一种或然性。如果每看到一个案例,我们都能探究出其中的新要素和新的作用机理,那么,这个案例就被赋予了新的学理意义和学理价值,这才是学界应该拓展的问题意识。

学界应该更敏锐地把握事件背后的深层结构和可能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在民族学的结构分析中有很好的体现,如费孝通先生曾经深入乡村研究扫盲问题。建国初期,政府曾通过开夜校等方式为民众扫盲,以期提升大家的文化素质进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但这一政策在有些地区不被当地人接受甚至无法顺利执行。费孝通先生通过实地研究发现,这些地方存在一种几千年形成的稳定的乡土结构,扫盲的政策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无法改变这种稳固的大结构,所以,可以把扫盲政策比喻成滴进池塘中的一滴白酒,后者很快就被稀释,发挥不了作用。这个案例表明,民族学对于微观案例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一些事件会重复出现,或者说在哪些环境和哪些条件下会重复出现,又会有什么样的新变化。

其次,在民族问题研究上,建立中国自己的分类数据库是实现学科研究突破的重要途径。我认为,我国的科学研究已经有了足够的积累,应该进入建立自己的分类数据库的阶段。数据库也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种表现,西方有很多的数据库,有的基于某个国家,有的基于全球,建立和使用数据库是一种很高端的信息收集和加工的过程。但是,目前国内学者在外语能力和数据库使用方法上存在一些不足,导致无法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并且缺乏我们自己的分类数据库。其实,就当下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而言,无论是财政方面还是基本的学科素养方面,都已经具备建立数据库的基础。目前,世界范围内民族类事件的相关信息量极大,涉及的族群群体数量也很大,中国情况也类似。要深入研究这些事件或关联群体、进行由点到面的综合性分析,建立和使用分类数据库可以为研究提供一个突破点,这是应该要做的,也是必须要做的。

最后,可以通过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路径来拓展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提倡这一路径主要基于两个原因。首先,回到前面所说的中国三大学派各有局限的问题,从国家需求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其局限性主要在于它们与政治社会学的对接不够。“燕京学派”强于文化和社区研究,政治性较弱;“延安学派”与政治社会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多样性和实际诉求对接不够;“史

学派”缺乏对现实政治的直接回应,对传统与现实的关系讨论不足。而政治社会学可以弥补这些学派的短板。比如,中国学者从国际政治学视角去研究乌克兰危机和苏格兰独立公投事件,其对这两个事件的基本动因和过程的分析比较宏观,不够细致,原因是两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民族结构的了解探索不够深入。相反,学界对2016年美国大选和特朗普上台的事后分析就显得比较深入和透彻,因为了解美国的社会结构,对美国的投票选举结构,可以根据美国的社会阶层、教育水平、宗教信仰、种族状况等因素进行选民分层,来研究他们的政治偏好,这种研究方法正是借用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路径,从而充分展现出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

其次,民族问题本身就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从国际政治视角研究民族问题,避不开民族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如何介入国内和国际的政治体系中,以及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等问题。民族群体不是作为孤立群体介入其中的,一定是与特定的社会发展趋势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市场化和信息化、民主化、现代国家建构,这些大的政治社会进程是跟政治体系、政治进程高度关联的,必须要结合起来讨论,因此需要政治社会学路径。我较早开始研究网络民族主义议题,以信息化与民族问题研究(特别是民族主义研究)举例,这个议题关注的主要是信息化进程对国别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带来哪些新的影响和变化,以及各国各区域在民族问题的治理,以及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方面如何与之对接。全球各界都在讲“互联网+”,那么,相应地,民族工作是与互联网相联系的,民族冲突也一样与互联网有密切联系。以斯里兰卡为例,在内战结束之前的战场主要是物质性的战斗场所,而内战结束后,互联网成为斯里兰卡民族冲突的主战场。泰米尔人(包括海外离散的泰米尔人)举行全球公投就是依靠互联网这个工具。再看巴以冲突的例子,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会对维基百科中关于巴以冲突相关词条定义权进行争夺,一方撰写了词条,另一方马上就去修改,这说明互联网空间出现了一种话语权、叙述和议题设置权的争夺,而且这种争夺的意义特别重大。^①最后看美国大选的例子,特朗普赢得大选也与他频繁使用互联网社交工具有着一定关系。这些事例说明,民族问题与全球信息化进程结合在一起,要理解并把握这些新发展、新趋势、新变化及

^① 王军:《网络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

其蕴含的意义,政治社会学研究路径无疑能带来巨大助益。

这也是我在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做博士后阶段积累的心得体会,当吸收了新的学科知识之后再来研究民族问题,把民族问题研究与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研究联系起来,把网络民族主义与外交和政治制度研究进行对接,把政治与社会、国内政治跟国际政治进行对接。因为传统的国家边境线已经束缚不了当今的民族问题,需要国内-国际、政治-社会视角的融通和整合,而政治社会学的路径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运用政治社会学的路径去深耕现有的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是有很很有意义的,会大有作为。

问:您对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的未来发展有哪些预期?

答:我对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的未来发展有很多期待,并保持审慎乐观的心态。经过多年积累,学界的研究已经有了新的厚度和高度。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不间断的积累,可以说已经进入学术发展的高原,主要的缺憾是缺乏大师,就像学术高原上缺乏高峰。这就需要研究者在高原上继续耕耘盘整,在研究心态、研究机制、研究方法等方面夯实基础、凝练真知。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民族问题研究未来会有好的发展,不管是继续选择中国学派的研究路径,还是开拓其他新的研究路径,这个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会慢慢得以解决,知识点的增长、高质量作品的涌现及新一代学人的成长是值得期待的。